



深度

曾经监督政府的报纸，现在帮政府做微信号运营

市场和审查的双重压力下，一些报社向政府推出新闻服务，比如政务账号代运营、发宣传稿，甚至把编辑直接派到政府办公室办公。

特约撰稿人 于文乐 发自香港 | 2019-07-30



近几年，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和政府审查的双重挤压下日趋衰落，为了“求生”，它们转而承包了政府的政务宣传需求。摄：Wei Liang/CNS Photo/VCG via Getty Images

“我感觉我快要失业了。”5月25日以来，焦虑弥漫在张玲任职的广东某报社。

当天下发的一份政府通知要求：“对不符合上级规定的政务新媒体立即启动关停程序”。政务新媒体，指中国大陆各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微博、微信、抖音、头条等第三方平台上开设的账号（亦包括其自行开发的移动客户端等），用于发布各机关权威资讯、政策及领导动态等。不少政务新体会依据所在平台的属性，采取“人设化”的运营策略，即赋予账号鲜明的个性，并善用各类网络语言，拉近与网民距离。

这其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便是“@共青团中央”微博、微信账号——自称“团团”，“敢于在公开场合表达爱国情感”。2013年成立后，“团团”在曝光“台独”、“港独”艺人、揭批“精日”分子、反对侮辱革命英烈等事件中频频发声，并吸引、制造了大批被称为“小粉红”的网络爱国青年。他们常与批评中国现状的自由派公知发生激烈争论，还会翻墙到Facebook等平台声讨“台独”、“港独”和一切“反华力量”。能在舆论场上凝聚如此强大的民族主义声量，“团团”微博号功不可没。截止发稿，@共青团中央在微博上已积累了970多万粉丝。

据《人民日报》[报道](#)，截止2018年底，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开设的政务新媒体已达17.87万个。它们中的多数将会在这次整顿中关停。依照通知：区级政府在同一平台只开设一个政务新媒体账号，其下辖部门及街道原则上不再单独开设。

在这波关停潮中遭受冲击的，亦包括各类传统媒体。近几年，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和政府审查的双重挤压下日趋衰落，为了“求生”，它们转而承包了政府的政务宣传需求，并形成了一整套多元化产品。比如，张玲的工作就是运营多个区级及街道政务微信公众号。如今，作为顾客政府开始削减消费，这令张玲和很多同事陷入了无事可做的尴尬。

政务新媒体大V：“引导舆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

通知发出后的几天内，深圳多个政务微信公众号发出停更公告并进入注销程序，其中不乏关注人数达20万的宝安区西乡街道开设的“新西乡记”等大号。

“一纸政府通知就可能让我丢饭碗，确实有深深的无力感。”张玲叹息道。

5年前，也是一纸政府通知令政务新媒体在大江南北火起来。2014年9月，网信办下发《积极利用即时通信工具开展政务服务的通知》，提出在2014年底即时通信工具政务公众号达到6万个。

一时间，各类互联网平台出现大量政务账号，并诞生一批“大V”（指在平台上获得身份认证、粉丝数超过50万的账号）。除了@共青团中央，还有@国资小新、@中国警方在线、@中国消防、@平安北京、@上海发布等等，它们粉丝众多、发的内容话题性强，常常引发舆论热议。

比如，粉丝超500万的国资小新，由正部级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不但积极与网友互动，还会主动“蹭热点”。电影《流浪地球》热播期间，原著作家刘慈欣曾经谈论自己在国企工作的言论被网友翻出来——“特别像电力系统这种工作，你必须按时去上班，坚守岗位，那么坚守岗位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那里写作了，（我）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在这个岗位上写的。”这段话被指讽刺国企“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国资小新主动转发了这段话，回应称：“刘老师，之所以要深化改革，就是因为过去一定程度上存在您说的这种人浮于事的现象。还是改革好，企业能专心搞发展，您也能专心写小说。如今，咱们的特高压已经成了响当当的国家名片，您也成了中国科幻界的领军人物。欢迎您常回娘家看看，再体验一把。”这段隔空对话旋即登上微博热搜，有评论认为，这是政务新媒体主动回应公众关切、有效引导舆论的典型案例。



“团团”上线于2013年底，由年轻的编辑负责日常运营，目前已有近3万条微博、800多万粉丝，基本上每条微博下都有2000以上“赞”，数百转发。“团团”是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的暱称。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关于政务新媒体的功能，2018年底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做出了明确要求，包括：“凝聚群众”，“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引导网上舆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等。

但对基层地方政府来说，开设账号还有更为直接的需求——政治考核。一位知情人士对端传媒表示，某地区曾被评为“党组织软弱涣散基层”，为向上级表明整改决心，便开设了政务新媒体号，用来发布整改获得的成绩。另一个原因是，官员奉行“唯新”政绩，热衷于提“新观念”、“新思路”、搞“新工程”，地方政府及部门间存在竞赛心态，恐怕落后。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端传媒坦言：“别的部门街道都有，我们也必须得有一个”。

上述心态亦导致了政务新媒体的泛滥和低质。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浙江省长兴县29个部门一共开设218个政务微信公众号，加上村、社区一级，总数更是达到282个。

数量众多的账号活跃在舆论场的同时，也产生大量难以管控的言论，引发争议，“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时评人曹林针在[一篇针对关停潮的评论中指出](#)，政务新媒体存在的问题是强化了新媒体属性，而忽略了政务属性：“公众真正关心的政务信息没发几条，正经体现信息公开的新闻没几条，有的多是搔首弄姿的蹭热点，自娱自乐的抖机灵，自吹自擂的营销，与部门事务毫不相关的鸡血鸡汤，华而不实的标题党，沾染了自媒体诸多恶习。”

2019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文点名部分政务新媒体](#)，细数不顾形象娱乐追星、主观泄愤回怼网友、雷人雷语影响公信、信息失真误导舆论、随意转帖任性发声、疏于管理账号被盗、长期停更功能失效、强制下载转发点赞等“八宗罪”。

比如，湖南省永州市文明办工作人员用官方微博“文明永州”为某嘻哈明星“打call”；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一名群众向“贵池区人民政府发布”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咨询信息，却收到了“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我仿佛听见了一群蚊子在嗡嗡嗡”等雷人回复。甚至有人因“失言”而获罪。2015年6月30日，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交警大队官方微博“@子洲交警”转发帖子，批评1950年的土地改革政策。该微博管理员旋即在7月2日被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另有多名干部被处分或训诫谈话。

报社的新“生意经”：“日常是拉业务，业余才是写稿”

据《[2018中国政务新媒体发展白皮书](#)》统计，中国政务新媒体从业人员大约在60到80万人，包括专职和兼职。

其中，不少基层政府因编制有限、人手不足，选择将政务新媒体编辑业务外包。比如上文提到的浙江省长兴县282个政务微信号中，有59个政务微信托管外包，总计金额289.50万元（人民币，下同），某乡镇政务微信号每年支付20万元的运维费用。

基层政府将政务新媒体工作交给报社，一方面是因为报社作为事业单位，接受政府领导，政治上可靠；另一方面，报社仍具备一定宣传实力和品牌价值，从业人员也有新闻传播知识。



图为北京一个报摊，报纸报导李鹏逝世的新闻。摄：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对报社来说，这亦是一笔极具诱惑的生意。近年来，报业的商业广告和订报量出现断崖式下降。来自[2018中国报业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报纸阅读率已从2012年的53.9%下降到2018年的25.6%，降幅超五成。首当其冲的便是面向市民的都市类纸质媒体，2018年休刊的53份报纸中，都市报占据了四分之三。

如何拓展收入成为报社不得不解的生死命题。2017年，阿宝曾在广东一家都市报做新闻记者，她所在的机动部门是整个报社唯一不跟经营挂钩的，“做最纯粹的新闻，接到爆料电话就马上出发，到现场采访突发新闻”。

刚开始，一篇好的突发报道还能得相对不菲的稿费，“只靠写稿子就能维持收入。”但这样的光景转瞬即逝，有的记者两个月发不出一篇稿，底薪收入甚至抵不过缴纳社保、公积金的费用，“反而还被报社财务部门叫过去补缴费用”。很快，该部门被解散，有记者去其他媒体继续做机动新闻，阿宝则转岗去了区域新闻部，被派驻到某区做区级部门及街道的新闻报道工作，“但本质就是做经营。”

在报社的算盘中，区级部门和街道看起来虽小，却是业务开拓的重点对象。“一个区有大大小小的部门和街道，手里都握着或多或少的宣传经费，加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阿宝日常工作就是参与各类政府部门或街道举办的会议及活动，在报纸上发稿宣传，例如某街道消除某处烟火存放点隐患、举办交通安全宣讲、学习上级重要会议精神等。不过，这类新闻因为过于琐碎，“就算登上报纸也是豆腐块，换算成稿费只有几十块，一个月加起来也就几百一千的。”

一位同事游说李婷：“最好不要发表这篇报道，因为街道书记很生气，会影响我们的项目合作关系……”

但刊发这种“豆腐块”，是报纸维护与相关部门关系的重要方式，其最终目的是向政府部门推销各类付费“新闻产品”，包括政务新媒体代运营服务、版面宣传等，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如果项目成交，记者就能从中获得相应提成，这也决定了记者最终收入水平。“所以日常是拉业务，业余才是写稿。”

令李婷感到难过的是，业务的优先级已高于写稿。做过机动新闻的李婷曾写过一篇民生报道，有部分内容质疑了辖区街道的工作。让她没想到是，发表的阻力不是来自“外部因素”，而是同在报社的同事——该同事跑线的街道正好是李婷报道中所提到的，他直接游说她：“最好不要发表这篇报道，因为街道书记很生气，会影响我们的项目合作关系……”

李婷感觉到不同寻常的压力：“我们是市级媒体，本来是归市委宣传部管，在政治级别上是

有权监督下属区级部门及街道的，万万没想到现在连一个街道办书记，都能来干扰报道。”

在报社领导的“协调”下，这篇报道最终没有发出。

报道萎缩的同时，业务却越做越顺。以政务新媒体代运营为例，报社只需出卖编辑、美编、校对等人力资源，减去人员日常工资，剩下的就是纯利润。例如阿宝所在的H报社，一个小编的工资待遇大概一年12至16万，却可运营多个政务公众号。而为了进一步削减成本，报社会把业务再一次外包给规模较小的企业，将人力成本压缩到最低，赚取更多利润。

此外，报社还面对政府宣传需求打造了多样化的服务产品，包括小程序开发、视频拍摄、活动策划等，甚至可以“打包人员”——派驻新媒体编辑直接到政府办公室办公。



北京的一个报摊。摄：Nicolas Asfour/AFP/Getty Images

李婷就是这样的“打包人员”。面试时，H报社负责人曾向李婷许诺：会在新媒体技能上加以培训。但跟着编辑、记者学习了几个月后，李婷就被报社派驻到某机关办公室，“名义上是让我帮忙运营公众号，但实际还会派各种杂活，包括复印材料、整理材料、接听电话诸如此类的。”

更让李婷受不了的是，机关办公室主任直接对外宣称，李婷就是他们机关购买的服务。“谁都想要来使唤我，感觉就像被卖了一样。”

“新闻媒体有甲方这个词，让我很意外”

张玲的际遇和李婷相似。从传媒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H报社做记者，不久后主动申请转岗做新媒体编辑。张玲觉得做记者不符合她喜欢坐办公室的脾性，另一方面，“新媒体是比较新兴事物，感觉有发展空间，以后也可以带着经验跳槽。”

但很快，张玲就发现现实与预期的巨大落差。一开始，她被安排运营2个政务公众号，每个工作日都要发布内容，后来，塞到她手里的公众号逐渐变多，顶峰时达到了6、7个。由于微信公众号平台限制，每个手机只能绑定5个公众号，张玲甚至还要借同事的手机才能登陆平台后台。

本以为做新媒体是运用新技术、新语言去突破报纸带来的局限，但更多时候，张玲的工作不过是复制粘贴，将记者或政府部门发过来信息配上图文，再交给美术编辑，“完全学不到任何新东西”。

在内容上小编一般没有什么自主权，“只是按照政府要求”。一位在广东某街道办公室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对端传媒表示，选题多数是政府工作成果展示，例如环境整治、辖区举办的大小活动、领导到某处调研等。最好的内容是“重要的会议或工作成果”，如果某天的推送没发布街道的政务信息，“相当于没有头条”。

至于是否能吸引阅读，该工作人员表示：“一开始领导还会要求要达到500阅读量，但后面也不提了。”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在报道中曾引述一位工作人员的话称：“对于乡镇政务微信公众号来说，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打卡晒成绩”。”

不需要很长时间，张玲就掌握了工作节奏，快的时候，几乎2小时就能完成编辑初稿工作，但接下来，却是漫长的层层审核、修改。“这个过程最煎熬，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这上面。”内容先要交由报社领导审核，再经政府部门审核人提出修改意见，最终才能确认发布。

修改涉及方方面面，除了错别字、排版风格，也包括领导称谓和各类政治表述等。在H报社，小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遇到的“奇葩修改要求”。比如，一位工作人员站在部门领导旁为其撑伞的照片，被要求用PS软件将伞抹去；照片的排序同样重要，大领导照片一般在图文的上方，然后依据职务等级依次排列其他干部照片。如果同级领导在同一会议或活动出现，要按相同篇幅呈现。“有时候一个职称、一个标题几个字来回改动，经常拖延到晚上11点发布，如果有不确定的地方，政府审核人就宁愿延期再发布。”

一开始，张玲对这些细微末节的修改还略有抵触，不过很快就变得麻木：“反正对方是甲方，必须有求必应。”至于工作质量，也无从评价，“都是一些政务信息，很难有任何创新，一任甲方领导说你做的好，但换了一任领导，有新的理念，就又会说你做的很糟糕，好坏基本上都是看领导喜好，就是一场政治游戏。”



本以为做新媒体是运用新技术、新语言去突破报纸带来的局限，但更多时候，张玲的工作不过是复制粘贴，将记者或政府部门发过来信息配上图文，再交给美术编辑。摄：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在广东某市级媒体工作的文丽对张玲的遭遇深表同感。“新闻媒体有甲方这个词让我很意外。”文丽本科双学位和出国读研都选了新闻专业，她的职业规划原本是做一段新媒体，然后转到深度报道岗位，后来才发觉，“哪里还有什么深度报道？”

文丽被分到视频拍摄团队担任文案，专门为某部门拍各种宣传片。拍摄内容大部分是遵循甲方要求，“一般完全看上级文件的意思，四平八稳的党政风格，基调要积极，宣扬主旋律。”在她看来，自己所在的媒体更像是一个公关公司。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适应后，阿宝已经掌握了作为“公关公司”的经营窍门——抓住对方宣传的需求。“一般街道办听区政府、区政府听市政府，一层一层传递下来，从扫黑除恶到安全生产，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各级都需要做宣传，向上级表态有贯彻落实，这时候你就要拿方案去谈。”

有自媒体点评这一趋势：“赚到钱才是本事，活下去才是根本，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够等到凤凰涅槃的那一天。”

阿宝所指的方案不限于报纸版面宣传，还有漫画创作、H5小程序、微信创意文案等新媒体产品。“做报纸宣传已经很难做出彩了，现在越来越多部门希望出创意产品，这样他们的政绩上也会添一笔。辛辛苦苦做了一年，不做有效果的宣传，他们也怕领导看不到工作成绩。”

尾声

阿宝感觉，谈项目越来越难了，“现在可选择的媒体同行太多了，大家都想吃这碗饭。”

在18年12月举办的“智库型媒体发展高峰论坛”上，《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梅志清称，该报将转型打造智库型媒体，“既要发挥好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的作用，也要发挥好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引领作用。”

南方报业集团系广东省级媒体，旗下的《南方都市报》曾以犀利的民生监督报道而闻名，2003年更曾突破官方消息封锁，成中国大陆第一家报道SARS疫情（非典）的媒体。2019年6月1日，深圳南山区一船艇研发基地发生火灾，《南方都市报》在其运营的“深圳大件事”上做了突发新闻报道，包括事故现场照片及视频，却在几个小时后自行删除，随后又再次发布了删减过照片和视频的版本。据知情人士透露，此举引发了内部争议。也有业内人士质疑，这是为了维护好与该区政府的关系，“南方都市报其实也一直有在向政府靠拢的倾向。”

深圳报业集团旗下的《晶报》则发文称，其运营的政务新媒体项目已超过140家，2018年新媒体收入4433万元，形成了囊括政务微信、政务微博、舆情应对等服务在内的完善的“政务融媒体服务生态链”。

有自媒体点评这一趋势：“赚到钱才是本事，活下去才是根本，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够等到凤凰涅槃的那一天。”

公众号关停后，办公室主任表示，将会安排新的工作内容给李婷。她唯一的盼望是留在报社，不被派驻去政府部门。阿宝的想法也很实际：“现在跳槽到哪个媒体都一样，不能做最纯粹的新闻，到手的钱也未必比现在多，还不如就安心待下来。”文丽则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势所趋：“面包和理想都想要是不可能的。”她正在积极准备转行，“下一步可能就去当码农了。”

应受访者要求，张玲、阿宝、李婷、文丽为化名。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大陆媒体如何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
2. 721全纪录：示威者涂污中联办，上环警方开枪驱散，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
3. 728示威：有救护员收到命令，指救护车须得警察批准才可以进入示威人群中救人
4. 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重组：警察在白衣人离开一分钟后到场
5. 京都动画和它试图对抗的两兆血汗产业
6. 谁拥有华为？
7. 727冲突全纪录：示威者元朗抗议涉黑白色暴力 香港警察对示威者频密发射催泪弹
8. 《寄生上流》／《上流寄生族》：永远无法获得解决的难题
9. 中国网红“出墙”来：百万订阅数的YouTube频道，诞生在没有YouTube的中国
10. 早报：港警承认元朗事件提前知情，迟到“39分”，警员离开合理，拒绝道歉

编辑推荐

1. 曾经监督政府的报纸，现在帮政府做微信号运营
2. 梁俊彦：这些年，激进何君尧如何收编元朗乡事力量
3. 728示威：有救护员收到命令，指救护车须得警察批准才可以进入示威人群中救人
4. 科爾奈：弗蘭肯斯坦的道德責任——關於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思考
5. 唯有写作使我快乐——专访胡晴舫
6. 727冲突全纪录：示威者元朗抗议涉黑白色暴力 香港警察对示威者频密发射催泪弹
7. 尹月：安倍修宪的野心与阻力
8. 吴可熙专访：我想要面对失败的我，被羞辱的我

9. 龚立人：请港府变回港人的政府，珍惜香港，守护港人

10. 吴祚来：当自由城邦遭遇末日帝国——六四幸存者眼中的今日香港

延伸阅读

刺耳的声音不见了？中国调查报道的冬天（上）

10年前的那个江湖，调查记者以兄弟相称，他们互通有无、行动一致，希望用自己的报导行侠仗义。

全面审查时代：中国媒体人正在经历什么？

这是一篇中国当代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口述史，在全面审查时代下，他们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越来越不自由的从业状态。

刺耳的声音不见了？中国调查报道的冬天（下）

报道做不了、发不出，比这更大的打击是——他们发现社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报道而发生改变。

习近平新闻座谈会后，都有谁表态“姓党”？

年度回顾——2018年的全球传媒业：悲情之下，待解的难题

从根本上来说，传媒业只有解决了自身的难题，才能更好地抵抗外界的恶劣环境。